

胡峰
著

诗界革命

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

胡峰
著

诗界革命

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诗歌本体的现代转型研究/胡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61-6545-4

I. ①诗… II. ①胡…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0003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69千字
定 价 62.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开始了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艰难转型，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诗歌也开始了从旧体诗（格律诗）向新体诗（自由诗）的艰难转型。旧体诗与新体诗如同两个桥头堡，划分出两种不同的诗歌观念、文体观念和审美观念。多年来，学术界将旧体诗与新体诗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形式来进行研究，在各自的领域皆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中国诗歌如何完成了从旧体诗向新体诗的转型？这是诗歌研究领域一个亟待解决而又未能很好地得到解决的诗学问题，是诗歌研究领域一个有待深入拓展的领域。从这一角度来说，胡峰的博士论文《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是一个非常有学术理论价值的选题。胡峰对诗歌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选择“诗界革命”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力图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诗歌如何完成从旧体诗向新体诗的转型。

格律诗形成于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新体诗出现于 20 世纪初，是现代诗歌的滥觞。学术界一般将新体诗的出现与胡适联系在一起，这是有道理的。胡适大力提倡诗歌革命，开创了现代新诗的新局面。然而，新体诗理论并非是胡适的首创，新体诗的实践也并非开始于胡适。早在胡适之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就在思考、探索诗歌的改革问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诗界革命”。多年来，由于意识形态等各种原因作祟，晚清文学（或曰近代文学）处于尴尬的状态，徘徊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中间地带，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作为晚清文学重要构成部分的

“诗界革命”自然也难以幸免。现在，随着意识形态的祛魅，随着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晚清文学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国内学术界在晚清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尤其在史料的整理、文学史的编撰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海外汉学界对晚清文学的研究则在理论方法、观念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对国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深刻地揭示出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我们探讨旧体诗向新体诗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坐标。

导致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原因，也有诗歌内部自身的原因。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此，从诗歌内部出发来深入探讨才能说清楚旧体诗如何向新体诗转型这一复杂问题。胡峰巧妙地抓住了诗歌转型这一命脉，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切入来探讨旧体诗向新体诗的转型问题。诗歌本体是指构成诗歌特征的基本要素，包括语言、节奏、意象、体式等。众所周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形式成为区分旧体诗与新体诗的重要标准，旧体诗与文言、新体诗与白话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对应关系，要探讨旧体诗向新体诗的转型就必须讨论从文言向白话转型的问题。黄遵宪提出的“我手写吾口”的理论主张，从理论上开启了口语入诗的先河，确立了口语入诗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预示着文言在诗歌中地位的衰落，旧体诗的解体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胡峰从方言、新名词入诗着手来探讨旧体诗的解构与新体诗的建构，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对诗歌转型的分析深入透彻，揭示出其内在的规律。语言本身是有声音有节奏的，旧体诗正是依据这一点确立了平仄、押韵等格律规范，从而成就了中国格律诗的辉煌。而平仄、押韵等格律形式是建立在文言的基础之上的，从文言转换成口语（白话）之后，旧体诗中的平仄、押韵等形式规范受到挑战，口语（白话）与文言的声音、节奏不同，建立在文言基础上的格律规范难以适应白话语言的需求，因此如何探索确立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节奏规律，就成为新体诗的一个重要任务。胡峰通过具体的文体分析，归纳概括出了新体诗的语言节奏模式。意象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诗歌创作的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从文言到口语（白话）的变化必然带来诗歌意象的变化，旧体诗中的传统意象失去了活力，

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新的词汇，造新名词成为新时代的一个现实要求，而这些新名词成为新的诗歌意象也就成了可能与现实。胡峰在大量阅读文本的基础上，下功夫对诗歌意象进行分类归纳，概括出现代意象的特征，从而揭示出诗歌的转型规律。诗歌是最具文体特征的文体样式，诗歌转型最终体现在文体形式上。文体是语言、节奏、意象的综合体，不同的语言、节奏、意象必然形成不同的文体形式，胡峰通过分析总结出传统格律体的局限及其解体的内在原因，归纳出了民谣体、歌体诗等新的诗歌体式，指出了新体诗所存在的散文化倾向。作者将微观分析与宏观概括相结合，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从旧体诗向新体诗的历史转型，有力地论述了新诗在晚清文学中就已经发生存在这一事实，对原来已有的新诗发生学结论进行了改写。作者以史料说话，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由此得出的结论不仅新颖独到，而且非常具有说服力。

从诗歌本体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诗歌的转型问题，这是一个颇有难度的研究课题，研究者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理论功底，而且需要具有敏锐的诗歌鉴赏力。胡峰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论文外审和答辩过程中受到外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好评，论文在后来获评为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

选择攻读博士学位是胡峰在学术征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其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必将会对其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胡峰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衷心祝愿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以此共勉。

吕周聚

2015年5月17日

目 录

序	吕周聚 (1)
导论 研究热土中的“飞地” ——诗界革命中诗歌本体的现代转型研究	(1)
第一章 文言的解体与白话的探寻	(23)
第一节 诗歌语言: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开端	(24)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便于交流与凸显主体地位的口语	(37)
第三节 “天籁难学”:对抗正统的方言	(57)
第四节 “开新壁垒”:牵引表达与情感体验的新名词	(68)
第二章 声律节奏传统的失范与自然方向的确立	(90)
第一节 韵律规则的破格	(92)
第二节 节奏模式的解放	(112)
第三章 现代意象的创造及诗歌功能的拓展	(128)
第一节 物态化意象的丰富与新变	(131)
第二节 事象的增加及影响	(144)
第三节 意象空间的收缩与诗歌功能的拓展	(161)
第四章 自由诗体的多维探求	(176)
第一节 传统格律体:难以固守的旧诗体	(177)

第二节 民谣体：易于普及的民间形式	(191)
第三节 歌体诗：自由与诗性的统一体	(204)
第四节 散文化诗体：彰显性情的灵活样式	(219)
结语 诗界革命对现代新诗诞生的发生学意义	(241)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0)

研究热土中的“飞地”

——诗界革命中诗歌本体的现代转型研究

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研究并非一个陌生的课题，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皆瞩目于这块热土而且成果甚夥。但是，无论是对这一诗歌运动的整体评价与定位，还是对其内部细节的探究与梳理，至今仍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及空白。特别是在对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之间的关系的认定上，无论是肯定的意见还是否定的声音，都需要更充分、更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对诗歌的转型研究而言，外部因素的探讨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失对诗歌本体结构的嬗变的考察，则显然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泛泛而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使人信服。因此，重新厘定诗界革命及其与现代新诗发生之间的关系，必须把诗歌本体的特点与变化纳入研究的视阈之中，并作为重点予以观照。

一 研究现状与选题依据

包括诗界革命在内的晚清文学甚至整个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多年以来的古代文学史著作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态度十分淡漠，有的把它视为逐渐游离于“古代文学”这一母体的尾巴，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也有的则干脆将其完全

排除在文学史写作的视域之外，而把它推给近代或现代文学史，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尽管提及近代文学是清代文学四个阶段中的一个，但著者在对清代文学进行梳理时则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与之相对的是，不少现代文学史著作则直接从1917年前后的新文学运动写起，在时间上没有与古代文学建立起必要的对接与延续，从而使得近代文学成为一块少人问津的“飞地”。这自然会给读者造成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断裂”乃至对立关系的错觉。倒是近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出现，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所遗弃的近代文学纳入自己的领地，从而建立起古代文学史向现代文学史过渡的“桥梁”，并成就了自身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与“合法性”。郭延礼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自序》中说：“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80年全部文学创作表明：近代文学是作家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经过痛苦反思之后所形成的觉醒的、蜕变的、开放的文学。尽管这种蜕变中的文学还未能登上文学的顶峰，也没有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惊天动地的业绩；但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过程中的变化轨迹和复杂的文学现象却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它在探索前进中的成就与失败，都值得文学史研究工作者认真总结。”尽管如此，“建国后对这段文学史的研究是极其薄弱的，尤其是总体性的研究更差”。^①这不仅指出了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且也点明了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整体不足。而这种研究的不足恰恰是今后的学术生长点所在。

有意思的是，在新文学运动之后不久出现的几部文学史论著曾对所谓的“近代文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胡适在发表于1923年2月《申报》上的《最近之五十年》（即后来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1872年之后的文学概况进行了大致梳理。尽管该著作存在明显的偏颇之处——出于鼓吹白话文学特别是文学革命的目的，更多地强调了1917年以来的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而把此前的文学更多地视为古典文学的“末世知音”——但把新文学运动放置在后人所谓“近代”文学的背景下进行观

^①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自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照，本身就是对二者内在关联的肯定，从而也给后人以思路上的启迪。稍后面世的陈子展所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部文学史，“不仅没有人云亦云地照搬胡适，而是独立机杼，自创一说”，明确肯定了近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文学的各部分都显现出一种剧变的状态，和前期大两样”^①。陈子展甚至断言：文学“到了这个时期，就开始要求创造现代的现代人的文学了”。^②这就把自1894年以来的文学所特有的现代性质凸显出来，从而实现了这一阶段文学与此后文学的有效衔接。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更是把康有为、梁启超等诗界革命的主将直接收纳在“新文学”一编中，并把他们排在胡适之前进行论述。倒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言》中明确指出了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之间的承继关系：“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捡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说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③遗憾的是，这一颇具开创意义的论述，在后来的文学史著述中被遮蔽起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得到响应与拓展。

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文学在一夜之间完成了由“丑小鸭”向“白天鹅”的蜕变，成为学术界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争相谈论的热点话题；而且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开始重新“圈地”，在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重新进行了“血缘”关系的认定，确认了二者的承传乃至母子关系。于是，所谓的“近代文学”领地内也纷纷树起了现代文学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界碑。近代文学研究出现这种

① 徐志啸：《〈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导读》，载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③ 朱自清：《现代诗歌导论》，载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349页。

“冷热两重天”的强烈对比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学史观的更新及文学史重构的讨论。要新的文学史观的统领下重新书写文学史，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新文学或曰现代文学起点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不少专家学者在重新打量现代文学发生的资源和语境时，近代文学（1840—1917）这一长期被遮蔽的领地被开掘出来，瞬间由少数人涉足的荒地变成了众人争相开采的热土。在这一研究领域内，单是来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就不乏其人，前有陈平原、刘纳、王德威等专家的拓荒，后有钱振纲、杨联芬等学者的跟进，而且研究队伍与学术成果与日俱增。纵观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立足于现代文学，对近代文学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的发掘，以及对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的论证的确振聋发聩。这不仅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疆域，而且为当下及将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提供了重要资源与参照。但是，通过对各位方家的成果综合考量也不难发现，他们对晚清小说的耕耘可谓是成果丰硕：陈平原先生的学术奠基之作，同时也是其代表性著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详尽论述了晚清小说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及特征；海外学者王德威先生对中国大陆学界影响极大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同样着力于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研究。钱振纲先生新近推出的《清末民国小说史论》也不例外。与之不同的是，刘纳先生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与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两部著作是对现代文学转型的宏观考察，但前者所论及的诗歌也颇为有限，而后者更是把诗歌这一文类创作淹没在对小说深层耕耘的光影中。可以说，研究者对晚清小说的集中聚焦与对诗歌相对冷漠的研究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种情形与胡适最初发动文学革命时的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我私心以为文言绝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枪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①这种诗歌研究“门

^① 胡适：《答任叔永书——增订四版〈尝试集〉》代序一，《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庭冷漠”的状况的形成，固然是研究主体自身学术兴趣使然，似乎外人不得强求和置喙；但更深层次上也是由于研究者对诗歌本体缺少深入细致的关注所导致的。而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恰恰为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内涵的重新发现与厘定留下了极大的拓展空间。而且，众人对晚清小说研究的视角、方法与收获也无疑会成为研究诗歌本体转型的重要参照。

当然，对晚清诗歌尤其是诗界革命的研究也并非无人涉足，但研究者大多来自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如钱仲联、郭延礼、袁进、张永芳等著名学者。他们更多地从“近代”这一立足点与尺度进行论证与阐释，而没有以更具现代性的视野和方法去开掘研究对象中所蕴含的现代质素。如张永芳的论文集《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中所收文章主要偏重于诗界革命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承担角色及其贡献的考证与论析，对诗界革命的后续影响则较少涉及；郭延礼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对近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主要作家及作品、流派及思潮进行了详细的扫描和介绍。与之相似的还有李继凯的《中国近代诗歌史论》，该论著尽管一再强调包括诗界革命在内的近代诗歌运动对现代诗歌产生了影响，但对前者的分析仍偏重于概括而缺乏对诗歌本体诸要素的深入探究，因而在对二者关系的论证上仍显得说服力不强。

近年来，对晚清诗歌与现代新诗之关系的重新考量刚刚起步。王光明先生在其气势宏大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中把“诗界革命”列为第一章（“不可遏制的潮流”）并视为“百年汉诗”的起点，这无疑是其学术视野的创新与学术胆识过人的表现。但单就对“诗界革命”文学史地位的评述而言，该著在前后文中就“表现出存在缝隙，不太衔接，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孙玉石：《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序言》）。具体说来，作者承认“晚清的诗歌运动催生了‘新诗’这一概念……在后来成了现代中国诗人寻求现代性的重要指标，有着广泛的回响，因而是中国探寻现代诗歌形态的第一个驿站”——这显然是把诗界革命视为现代新诗发展的起始阶段——但该著又认为诗界革命中的创作“语言形式体制还是旧的，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因而‘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并不由它开始”^①。显然，

^①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这种评价和定位显示出作者观念上的复杂与矛盾。荣光启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未刊稿，首都师范大学）和赖戡煌的博士论文《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研究》（未刊稿，首都师范大学）从论题的确立、切入的视角和论析的深度上看，均有独到之处。前者主要采用诗歌文本、语言和形式理论的分析方法，侧重于诗歌语言、形式与现性语境中的个体经验的纠结、互动对诗歌发生的影响；后者着力于诗歌言说方式的寻求与建构，主要从格式的转换、经验的牵引、情感的表现、诗艺的寻求以及现代性对古典的压抑与规训等问题进行梳理。二者均从晚清的诗歌运动谈起，但诗界革命不仅在各自的论文中所占比例极小，其论述重点也都集中于对诗歌语言的论析，而且也没有把诗界革命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发展等嬗变关系进行比照论析。诚如作者所清醒地意识到的那样：“对于‘白话诗’‘新诗’‘现代汉诗’这种现代诗歌文类的确立，只是在语言衍变和艺术规则变化的向度上谈了一些问题，远远没有为这种现代诗歌文类的何以‘确立’提供清晰的答案。……对于诗歌研究而言，‘现代汉诗的发生’这个话题则远远没有结束。本文至此，看来只能算是一种‘引论’‘导论’而已。”^① 为现代诗歌文类的“确立”寻求清晰答案的努力是上述研究者没有开垦的领地，而这恰恰正是诗界革命研究亟待弥补与拓展的重要命题。

当然，也有对梁启超、黄遵宪等诗界革命的领军人物的整体文学活动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如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以及刘冰冰的博士论文《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黄遵宪诗歌研究》（未刊稿，山东大学）等。在这些著作中，尽管有的也涉及诗界革命而且不乏具有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的精辟论述，但由于诗界革命并非其研究的重心，因而对它的宏观把握与细节的触摸则难免失之宽疏。进一步讲，前述有关诗界革命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的只是对该运动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渊源、主题情感及艺术特征等方面的概述，如《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诗歌史论》

^① 荣光启：《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第209页。

等著作；有的是以语言的变化作为切入点来对其言说方式的嬗变进行分析，如赖彧煌等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只不过是抓住了诗界革命在诗歌本体转变上的某一个方面（如语言），而对其本体的整体观照与细致分析则付之阙如。这类成果当然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或者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诗界革命中诗歌外在形式的特殊之处，但对于认识这一诗歌运动及创作实践在诗歌内在本体上所发生的转向，特别是与现代新诗的发生之间所存在的血脉关联则显得过于简略。诗歌的转型固然是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诗人主体、传播媒介、读者接受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结果能够也必须以诗歌本体要素的转变作为内在动因与表现特征。诗界革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对诗歌本体研究的忽视，不仅影响了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认知与合理定位，更模糊了它与中国现代新诗之间关系的厘定。

应当指出的是，杨站军的博士论文《游移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诗界革命研究》（未刊稿，上海大学）是为数不多的以诗界革命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研究的论著之一。论文认定，诗界革命不是传统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桥梁，现代白话新诗也不是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自然的过渡和演变关系；相反，五四白话新诗是在诗界革命之外的方向上“另起炉灶”式的探索和发展。他认为，诗界革命归属于传统诗歌的范畴，是传统诗歌的终结，而与现代诗歌之间是互不相干甚至对立的断裂关系。但是，该论文并没有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与合乎逻辑的推理来证明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的迥异之处，只不过是泛泛论及诗界革命的发生背景、几个主要参与者各自的创作情况以及诗界革命与其他诗歌团体、流派的关系，甚至也并没有充分证明诗界革命的传统本质与“古典”特性。这无论如何都应该算作是一个遗憾。

由此可以看出，对诗界革命所体现出来的现代转型特质及其对中国现代新诗发生意义的研究和论述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特别是对包括语言、声律节奏、意象、文体等质素在内的诗歌本体的新变，更需要进行细致梳理与深入探究。这正是本文的立足点与关注重心所在。

二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以诗歌本体作为主要切入点，对诗界革命的理论倡导特别是诗歌

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新鲜质素进行梳理和论析。所谓诗歌本体，在这里主要是指构成诗歌审美世界的诸多要素的形态及特征，包括语言、声律节奏、意象、文体等。这些要素不仅是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必备条件，而且也决定着诗歌的审美面貌与呈现风格。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在诗歌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它的变化势必影响诗歌的基本形态；声律节奏既是语言的另一侧面，也是诗歌的声音要素，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一要素作为标尺来度量的；意象是诗歌形象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基本构成，不同类型的意象必然会使诗歌的形象特性与情感特征相互迥异；文体既是诗歌本体的结构因素，同时也是诗歌的外在呈现形式，不同的文体特征既是诗歌不同外在形态的直接展示，而且也能够折射甚至反作用于诗歌的内部结构方式。因此，从诗歌的本体切入，比一般的外部研究更能够把握诗歌的类型特征与审美形态。

当然，诗歌本体研究并非是纯粹地照搬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方法并机械地套用在诗界革命的研究中，而是试图在进行诗歌本体研究的同时，折射并勾连其背后所牵涉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形式”之外的“内容”因素。“在艺术中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因为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自己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同理，任何形式上的变化都已是新内容的发掘，因为，既然根据定义来理解，形式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那么空洞的形式就是不可思议的。”^①对于文学接受者来说，这一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任何人在进行文学阅读、鉴赏、评析和研究时，都不可能只关注内容而完全撇开形式不论；当然，也无法做到只欣赏形式而对其所承载的内容视而不见，因为此种做法也根本不可能准确评判形式的优劣与成败。因此，不少研究者都主张在研究文学本体形式的同时也要关涉文学的内容。但这种主张其实也包含着一种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把内容与形式分别单列的研究模式正是如此。为此，本文拟选择构成诗歌本体的几种重要质素作为切入口，以此观照诗歌转型时期本体诸要素所发生的新

^① [俄] 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载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1页。

变；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探寻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从而尽可能完整地把握诗歌本体的嬗变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结合起来，以避免走入置主题内容与环境等因素于不顾而单谈本体的片面的形式主义误区。

选择诗歌本体要素的研究还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诗歌是一种对本体要素有着根本性依赖的文体类型。如果仅仅局限于诗歌存在的时代背景、政治思潮、社会文化、传播方式或者读者接受等外部因素研究，那么这必将导致诗歌研究的独特性的丧失，而成为对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同样有效的社会文化决定论分析，而且这一做法容易脱离文学的轨道而旁逸到社会发展史、文化变迁史、思想过渡史等“非文学”的疆域中去，从而导致对诗歌特殊审美性质的遮蔽与失语。如果单从主题学的角度来切入，也无法把诗歌自身的特点凸显出来。而最能彰显诗歌变化的则莫过于其本体结构与形式的转型。诗界革命中的诗作，正是在诸如语言、声音节奏、意象、文体等结构要素方面从传统模式中突围而出并生成了新的特质与形态，而且这些形态呼应并关联着现代新诗的发生与发展。因此，诗界革命与传统诗歌的区别以及与现代新诗的联系，也必须依靠诗歌的本体研究才能得到有力的论证支持。而这恰恰是长期以来诗界革命的研究成果中所欠缺的。进而言之，诗界革命现代与传统性质的归属，乃至梁启超所谓“旧风格”的所指，并不能仅靠外部因素来独立判断，而应该对诗歌本体所体现出来的面貌与特征进行实事求是的论析与证明。这也正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拟运用发生学、文化研究、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理论，采用文化学、历史与审美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展开研究。文化学视角可以便利地把握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精神世界的嬗变过程；历史视角能够还原文学现象及文学创作发生的场域与动因，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场感；审美的视角主要针对诗歌的理论与创作文本，从诗歌本体的各种组成要素（语言、意象、节奏、形式、风格等）出发，发掘各自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及转变规律。

三 诗界革命的界定与分期

尽管诗界革命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人们对其意义的认识也越来